

新四军老八团中的“四大金刚”

赵东云

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新四军中，女兵属于较特殊的群体。由于出色的工作，她们深受战友和群众的爱戴，往往被称为“军中花木兰”。然而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中，却有四位女兵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四大金刚”，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大金刚” 雅号的由来

说起“四大金刚”雅号，就得先说说新四军“老八团”。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新四军开始组建，一大批进步青年加入各支队、团的服务团，不久又被合并进入全军的服务团，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同志，于是新四军有了女兵。

193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指示，战斗在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1937年底至1938年春，八团正在豫南一带整军训练、扩充队伍，经北平和河南省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推荐，杨寒、樊西曼、唐党民、王典训4位女同志先后来到这支支队参军，被分配在团政治工作。

入伍后，杨寒、樊西曼、唐党民、王典训剪去长发，穿上粗布军装，戴上军帽，打起绑腿，扎起皮带，远远望去，与男战士毫无区别。四位年纪不大的女战士，在老八团这个革命大熔炉中，从不娇揉造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豫南整训期间，她们不讲特殊，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拥挤的民房，地方铺草当床，盖的是单薄的军毯，和男战友别无二致。

1937年12月，豫西南地主武装在得知老八团主力外出的消息后，对团部所在地焦作园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消灭留守人员。危急时刻，4名女战士和团部其他同志一道，拿起武器，沉着冷静地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她们和其他指战员一起坚守阵地，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回援。战斗结束后，团首长对4名女战士提出了表扬，战友们也对她们战斗中的英勇表现钦佩不已，称赞她们坚毅果敢，战斗中“带着一股男子汉才会有的阳刚之气”，后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4位女战士为部队的“四大金刚”。不久，这个叫法便在部队里流传开来。

征途不知疲倦的宣传员

1938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集中于确山县竹沟进行整训，为东进抗日做准备。杨寒、樊西曼、唐党民、王典训一面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一面分头到基层连队教唱抗战歌曲，并走上街头，举办军民联欢会，为群众演出活报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把竹沟一带的抗日动员活动搞得热火朝天。3月8日，八团在那集举行誓师大会后，便踏上东进抗日的征程。从豫南

一月二十日新四军部队向敌后挺进



一月二十日新四军部队向敌后挺进

到皖西、皖中，漫漫征程五六百里，途经大别山，行军艰辛。4位女战士与其他战友一样，背着背包、米袋，一路跋山涉水，从不叫苦。途中，政治处派她们负责部队的宣传鼓动，4个女兵立即出发，行进在部队前方，见到乡镇、村落，就用石灰水、锅底灰、毛刷在墙上书写各类抗日标语，动员当地民众参加抗日；或在沿途路边树上、石头上放置谜语、口号纸条，供战士们猜谜、观看，以鼓舞士气、消除疲劳。遇到艰险路段，几个女兵就站在路边高处，或歌唱，或呼喊口号，一面为行进中的战友们加油、鼓劲，一面提醒战友们多加小心。由于长途艰苦行军，她们的脚底都走出了成串的血泡，疼痛不已。但她们从不叫苦，并相约不告诉领导和战友，用针挑破血泡、简单包扎后继续工作。

团领导见4位女兵过于辛苦，就有意分配她们跟随后卫部队一道行军。她们刚一加入后卫部队，就主动承担起各项收容工作，热心照顾伤病员、寻找掉队战友。到了宿营地，几个姑娘不及休息，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并进行社会调查。部队出发时，她们便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处理遗留问题。

参加战地服务团

1938年四五月间，老八团进驻皖中舒城、庐江、巢湖一带。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部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由樊西曼（23岁）担任团长。服务团的任务繁重，除了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外，还要组织民工输送伤病员，在战地、驻地开展民运、宣传工作，动员民众积极支持新四军。

在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战斗胜利后不久，几位女兵再次接受了抗日战火的洗礼。1938年6月，八团在大关、小关之间设伏打击敌人。当时，已占据合肥、徐州的日军，集结重兵由皖中向大别山进攻，八团决定在桐城至舒城间的大关、小关之间的公路沿线设伏，以6连担任主攻，其他部队担任掩护、阻援

任务。次日上午，当日军运输队进入伏击圈时，6连战士们开枪射击，并很快发起冲锋，一些没有枪械的战士挥舞着大刀、红缨枪也勇敢地冲进战场。这次战斗，击毙日寇10余人，俘虏1人，我方伤亡5人。王文山排长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战斗结束后，樊西曼强忍悲痛，和战友们将烈士的遗体抬下战场，整理好遗容安葬。

1938年秋，根据上级指示，老八团越过淮南铁路进军皖东。10月，八团在巢县夏阁镇袭击日军小队，和敌人进行白刃战。战斗取得了胜利，但特务连连长褚学忠、战士赵银多壮烈牺牲。当天下午，4位女战士为烈士整理遗容，并参加了烈士追悼会。追悼会上，4位女战士手持纸扎的白花，唱着“安眠吧，勇士”的悼歌，和全团指战员共同缅怀亲爱的战友。

1939年春节初一，日伪从合肥、巢县调集800余兵力，突袭八团团部驻地东山口、方老人洼一带。八团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凭借地势奋勇反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4位女战士和战士们共同战斗在第一线，和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宣传鼓动，为战友们鼓劲。这一仗，毙伤日寇70余名，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团士气，更在群众中树立起新四军的威信，4位女战士和服务团的形象也越发为群众所喜爱。

为开辟和巩固根据地贡献力量

初入皖东后，对敌斗争越发艰苦，4位女战士和服务团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战斗。她们走村串巷，到老乡家里走访、调查，在街头、集镇组织军民联欢会，演活报剧、话剧，唱抗日歌曲，动员地方民众支持抗战。她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奸奸》《打鬼子去》等活报剧，深受群众的欢迎。樊西曼在《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青年工人老李，惟妙惟肖，观众印象深刻，大家亲切地称她为“老李哥”；唐党民在《打鬼子去》短剧中扮演三嫂，情真意

切，深深打动了观众，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通过4位女兵和服务团卓有成效的工作，皖东民众很快被动员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新四军抗战——有的捐款、捐物，帮助部队解决给养，有的腾出房屋，供新四军战士们居住；还有许多当地热血青年主动要求参军，更有不少群众还帮助新四军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协助治疗伤病员……皖东地区很快掀起了抗日高潮。

多年后，周骏鸣团长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特别称赞4名女战士说：“那时她们到处写标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群众唱歌，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友黎立坚在回忆战争岁月时，称赞4位女战士“确实为团队做了很多工作，她们有坚强的意志，有革命必胜的信心，她们是妇女中的先锋队，是妇女的骄傲”。

193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五支队在罗炳辉司令员的率领下，继续东进，在津浦铁路两侧开展游击活动，着手创建皖东（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樊西曼、杨寒、唐党民、王典训4位女战士接受了新的任务，被分派到路西地区的定远、滁县、和含，在中共苏皖省委统一领导下，组织起多个精干的民运组，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动员广大群众，成立青抗、农抗、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团体，为巩固根据地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0年春，在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配合作战，先后取得路西、半塔反顽战役的胜利，淮南根据地初具规模。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樊西曼、杨寒、唐党民、王典训等几位女同志，被分别派往定远、盱眙、来安等地，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等职，继续为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挥洒汗水。（作者单位：安徽新华学院）

战至次日凌晨1时15分，八十一团将该股敌人全部歼灭，俘虏100余人。

20时，解放军各部从四面发起总攻，经4小时激战后，各部均突破敌人外围抵抗，冲入镇内，和残敌展开激烈巷战。战至拂晓，鉴于已经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九纵、十三纵按预定部署撤出战斗，并出其不意地跳出了内线，转至敌军侧后方。战斗当晚，道头附近各路国民党军尽管收到上司“立即驰援”的命令，但由于忌惮解放军围点打援，竟无一路向道头镇派兵。

天亮后，敌人这才发现解放军已然突破包围圈，慌忙调动空军机群到处搜索，在发现解放军的行踪后，立即调集整九师随后尾追，企图“扳回一局”。当敌整九师追至葛门口时，被早已等候多时的解放军二十六师给予迎头痛击，在付出死伤1300余人的代价后仓皇撤退。

此次战斗，解放军歼敌整八师第一六六旅第四九八团大半共1786人和第四九六团一个营，整个战斗连同阻援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320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500余名，缴获六〇炮4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31挺、冲锋枪17枝、步枪210支、子弹28000余发。不久，山东解放军指战员中开始流行起一句俏皮话儿——“敌人进攻到头（道头的谐音）了”。

棋盘山里的统一战线

刘新龙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的棋盘山地处江西和湖南两省交界处，丛山峻岭，林密水冷。1935至1938年，湘赣省委在此安营扎寨，以待革命发展的时机。

1937年冬，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曾山，一起受中央派遣赶赴棋盘山上村视察部队。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奉命与国民党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谈判，解决湘赣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

其时，正是内战和抗日战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革命以及革命军队正经受着重重困难的考验。地方保守势力非常强大，经常和红军游击队制造摩擦，给红军游击队带来重大损失。

当时的神泉乡乡长谭咏德势力非常强大，他不愿意看到红军游击队在自己的地盘上，经常对接近、资助红军的群众进行打压，甚至杀害。

湘赣边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谭余保早就想组织力量对谭咏德进行打击，可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谭余保不敢贸然行动。

在曾山的说服下，谭余保决定与谭咏德化干戈为玉帛。有一天，谭咏德来山上拜访谭余保。曾山和谭余保不仅热情地予以接待，对他打压红军游击队的事只字不提，而且称谭咏德为“老华”。当谭咏德得知曾山也亲自接待他后，更是大受感动。曾山和谭余保又将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加

以宣扬，经过几个小时的思想工作，使谭咏德认识到自己以前犯下的罪行。从此，谭咏德转变了对待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他不再与红军为敌，而且经常暗地里资助红军。

接着，曾山又给在莲花县城的驻军团长王崇良写了一封信。看过《为国合作宣言》的王崇良立即赶到山上村和曾山见面。曾山和谭余保等人对他晓以大义，让原本就有抗日救国思想的王崇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回到县城后第三天，王崇良就为红军送来了许多子弹、20顶帐篷，以及一些稀缺药品。最让红军上下欣慰不已的是，王崇良听说红军许多枪支火炮坏了使用不了，还特意派来了一个枪械修理师，这可是雪中送炭。

寒山区区长朱伯寅在得知谭咏德和红军游击队关系变好后，也想探探游击队的虚实。于是他来到山上，说是要拜访曾山和谭余保。曾山和谭余保热情接待他，并讲明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重要性，从而使朱伯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

由于湘赣省委和游击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路线，从而赢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尤其是减少了与国民党势力的正面冲突，保存了革命实力，使部队得以顺利整训。1938年2月，整编后的部队在刘培善、段焕竞的带领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后来改编为新四军1支队2团1大队。不久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被撤销，成立中共湘赣边特委，谭余保任书记，并继续带领80余人在棋盘山一带打游击。（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政协文史委）



战蟠龙，解放军充分发挥军事民主

胡遵远

1947年4月羊马河战役后，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近休整。国民党军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主力在绥德地区并正在东渡黄河，遂令其第一战区部队急速北上，并令驻守榆林的第二十二军等部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围歼于葭县、吴堡地区。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疾进，仅留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欠1个团）及陕西保安第三总队等部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决心趁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之机，进攻孤立据点蟠龙。解放军对国民党蟠龙守军发起突然攻击。敌人凭借外围高地和工事拼命抵抗，企图固守待援。

蟠龙的工事，都是在国民党军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精心设计，亲自监督”下完成的，异常坚固。解放军因缺少火炮，几次攻击都没有获得突破。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立即向彭德怀建议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总结研究更好的打法。彭德怀当

即采纳徐立清的建议，下令部队暂停攻击，一面继续加强土工作业，一面召开战地指挥员会议。徐立清则下到第一线督战指导工作、听取意见，号召各攻击部队抓紧时间发扬军事民主，讨论如何尽快打破敌人的坚固工事。

战士们群策群力，开动脑筋，很快就总结出了不少破解敌人坚固工事的有效战术。比如针对敌人工事高大坚固且构筑在山坡上，大型炸药包“很难送上去”的特点，有战士提出可以把战壕挖到碉堡下面，然后把炸药装到干粮袋里，随身携带到碉堡下，把干粮袋集中到碉堡外墙一处引爆，再针对敌人的阵地火力都集中在碉堡前面的特点，有人提出可以派几个战斗小组不间断地进行佯攻，掩护战友从后山爬上去等等。

5月3日下午，经过充分准备，解放军再次发起进攻。各部队按白天商量好的战术迅速推进，很快攻克了东山、北山和磨盘山等主阵地。黄昏后，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居高临下地向蟠龙镇发起总攻。徐立清又及时提出“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彭德怀听后高兴地对徐立清说：“这口号比炸弹药厉害得多啊！”

不久，解放军高喊“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发起总攻，战至深夜，攻克蟠龙镇，全歼守敌守军6700余人，并俘虏了李昆岗，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人民自卫军妙计歼敌

徐轶

1948年7月，在中共滇南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在云南省元江程程正式成立了云南人民自卫军。这支队伍由经过锻炼的干部和各族贫苦农民组成，成分纯洁，政治素质好。

8月，云南人民自卫军部队从朋程向元东进军，沿途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并向各族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所过村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迅速打开了滇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局面。

国民党云南当局得到消息后十分恐慌，连忙命令保安副司令陈宇铭、新平专员公署视察员王力健带领新平师管区独立大队到元江“进剿”，该部于9月7日到达猪街。

此时，人民自卫军通过统战工作，已经争取到猪街镇长高升福和羊街乡长高朝良等人的全力掩护和支持，完全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滇南工委和自卫军领导经研究决定，将敌独立大队调出猪街，在途中设伏，将其歼灭。

随后，自卫军领导多次化装到猪街一带观察地形，确定把伏击阵地设在猪街镇与猪街赶集场之间。这里是猪街经小羊街到元江县城的必经之路，三面有山包围，山上还有浓密的灌木林，是个打伏击的理想地点。

为了调动敌人，自卫军派地方中队和联防武装佯攻元江县城。国民党元江县政府急忙派人到猪街，命令保安独立大队火速回援。

撤回元江城。高升福立即通过关系把敌人回元江的具体时间告知了自卫军，并按照自卫军领导的指示，告诉陈、王二人，小羊街有“军费”可拿。陈、王二人大喜过望，立即决定部队绕道小羊街回元江县城。

9月14日拂晓前，自卫军进入伏击阵地，等候敌人的到来。上午11时左右，敌独立大队完全进入了自卫军的伏击圈。随着自卫军领导一声令下，自卫军战士立即开火。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纷纷卧倒。陈宇铭命令手下架起机枪向山上射击，但驮着机枪、冲锋枪、掷弹筒的骡马受到惊吓后四散乱跑，让敌人几乎无法卸下重武器。陈宇铭见状，命令手下突围，自己却和王力健逃到山沟里躲起来。不久，奉命突围的敌人发现指挥官不见了，更加混乱。自卫军战士乘机展开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自卫军优待俘虏”等口号，少数敌人听到后举着手爬上山顶投降。

自卫军领导见时机成熟，立即发起总攻。经过短暂交火，战士们击毙了几个负隅顽抗的敌人，从山沟里活捉了陈宇铭、王力健。残敌纷纷举手投降。

战斗仅一小时左右就宣告结束。此次战斗中，自卫军打死打伤敌人10多人，活捉陈宇铭、王力健以下130多人，全歼了敌独立大队，并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2挺、步枪近百支、短枪10余支、掷弹筒6个、手榴弹36个、子弹16000多发、骡马5匹、军用物资一部，大大改善了自卫军装备。猪街伏击战后，元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敌人进攻到头了”

贾晓明

滨海军区地方部队，在诸城地区机动作战，威胁侵犯胶东内地敌人的侧背，策应配合内线作战，寻机歼敌有生力量。

国民党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先后占领了胶县、高密、平度、掖县等10多座县城。此时，蒋介石判断解放军已经“节节败退”，便命令国民党军各部改“齐头并进”为“快速推进”。9月18日，国民党整编第八师冒进至道头，与整九师之间出现防线缺口。

道头古镇，地处招城以南30里，是招城门户，交通枢纽。其四周峦岗起伏，绵延不绝，是一个绝佳的设伏场所。据此，华东野战兵团首长决定在道头集中兵力实施反击，歼敌一部后转入外线作战。具体部署是：以十三纵队主力于夏甸一带进攻敌整九师，阻击右翼增援之敌；以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五团防守仰堂顶及其以南阵地，阻击左翼增援之敌；集中九纵二十五师（欠七十五团）、二十七师和十三纵三十七师歼击道头之敌；九纵二十六师为预备队，担任警戒、阻击任务。

18日9时，国民党整九师在飞机

的掩护下，以4个团的兵力向距离道头30里的夏甸一带解放军十三纵三十八师防御的阵地进攻，三十八师坚守阵地，和敌人激战8小时，毙伤敌1200余人，打退敌整九师的多次进攻，歼敌400余人。

同日上午，道头战斗打响。9时左右，国民党军飞机飞抵梁家高地，对九纵八十团阵地扫射轰炸，随后国民党军整八师的部队在远程炮火掩护下，向梁家高地发起进攻。八十团英勇战斗，和敌人反复争夺，战至17时，敌人始终不能占领梁家高地，反而损失惨重，疲态尽显。

15时开始，解放军各部按照既定部署，纷纷向敌整八师据守的村落和阵地发起进攻。敌整八师抵御不住，退入道头镇，企图固守待援。解放军各部乘势将道头镇团团包围。

与此同时，解放军八十一团开始攻击位于道头东北3里左右的李家庄、郝家庄、杨家庄等地，这里盘踞着敌人的一个加强营。经过激烈的短兵相接，八十一团指战员突入村子，将敌人彻底驱逐出阵地并分割包围。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当时山东战场的形势是：陈、粟首率率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南下苏、鲁、皖边区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开辟新的战场，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执行战略反攻，把战事引向了敌占区。在山东内线，由许世友、谭震林首长率领解放军4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坚持胶东半岛的防御作战。